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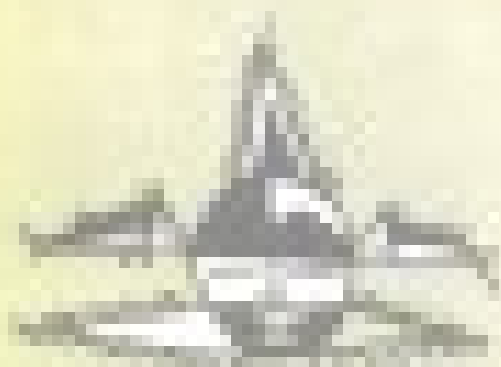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才思想史

雷楨孝 編著



中國展卷出版社

中國人本思想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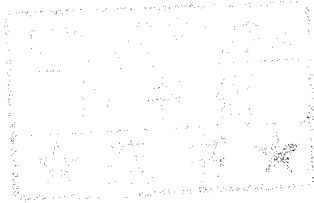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才思想史

雷禎孝 編著



中國
展
生
版
社

一九八六年 北京

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为大型著作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的第一卷（先秦部分）。第二卷将写汉至清的人才思想，第三卷将写近现代的人才思想。著者希望通过对前人的人才思想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发掘、整理和批判，奠定发展当代人才理论的基础。本书分简、概、详三编，可供不同阅读者略读、研究、详查之用。

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（第一卷）

雷 桢 孝 编 著

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）

湖北省安陆县印刷厂印刷

北京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24.75印张

550千字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

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1—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1271·014 定价：优质平装5.90元

杜任之

序

人才，向来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活的要素，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、最活跃的因素。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以至人类的文明进化史，都是见证。

一九八〇年，我就是本着这个见解给中国人才研究会筹备组写去一信，表示对人才研究的支持。

没多天，该筹备组的成员雷祯孝同志前来访我。恳谈中，我说我读到他的文章了，我认为很有见地，很有生气，很有生命力与现实感。那日我还谈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给他的建议。

之后，几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雷祯孝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人才学文章集子，我读了很高兴。由此对他就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。随即我推荐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评选。但由于报名截止，推荐为时晚了一步，此愿未遂，诚为一件憾事。

当时，据我所知，雷祯孝同志是国内首倡把人才问题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第一人。他的文章见地深邃，议论宏博，切合我们的国情与时代需要，也对人才的修养有一定的裨益。因之在国内不独引起了理论学术界的一定重视，也引起了多方面和不同层次的人们的兴趣。其特点，主要是他提出的问题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社会性；而其解决问题的理论既具有哲学基础，论据与论证亦还充分、翔实；同时，他笔锋犀利，文字简

明扼要，用词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。这是过去最初一段时期留在我思想里的印象。

后来，他离开北京，在外地工作中仍继续研究人才问题，并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。他曾诚挚地表示，愿以我为导师，加深对人才学的研究。我认为，在治学上持这样谦逊的态度是会有更好的成就的。我因此提出，愿他把正在著作的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及早脱稿，并寄我先睹为快。

一九八三年秋，他送来他写的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第一卷稿本时，我正卧病床榻，自顾不暇，即将他介绍给与我一起著作的高树帜同志，让先行过目。高树帜同志是我在解放前的学生、战友和解放后的助手，对于我国的经史与先秦诸子研究有素，现为中国政治学会成员，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、中华孔子研究所学术委员。雷祯孝同志旋即以同样稿本分赠，请其品评。他经过阅读，认为这个稿本引古比较充分，层次明晰，文理并茂，而且颇具规模，气势使他叹为观止！是古为今用研究人才学的杰作。后来，我病好转，阅读后，感到其工程之浩大，与着眼点之广阔，说明作者学识蕴藉之博且精与所下功力之深且巨，而其系统地荟萃与阐发，可以说前人所未有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为革命事业培养人才，遴选人才，对人才问题的研究是有浓厚兴趣的。我还特别愿意支持年轻同志们在这方面致力，以壮大这方面的力量，填补人才研究上的学术空白，并不断充实它。雷祯孝同志的这部著作可说即是人才研究领域的一项可观的成就，其中是有许多可贵的资料和论列的。譬如对先秦时期人才社会学思想的列叙，和对各个学派思想家的人才社会思想的概括与分析，就有可贵的现实借鉴或参考价值。

总之，我认为，雷祯孝同志这部著作的主旨：一是为社会

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；二是为发展社会主义人才学这门学科服务的。为此，我希望作者和有兴趣研究人才学的学术界的读者同志们，应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“三个面向”为指导思想，以天下人才管天下事的观点，站在前人的肩头，锐意进取，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人才学莫立更好的基础。我愿与大家共勉。

杜任之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，1985年12月

• 杜任之同志为哲学研究员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。

刘道玉

序

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全党的工作着重点逐步地转移到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上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邓小平同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人才的关系作了大量的论述。他指出：“我们要实现现代化，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。发展科学技术，不抓教育不行。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，必须有知识，有人才。”“我们培养、选拔人才，有广阔的源泉，有巨大的潜力。”“在人才的问题上，要特别强调一下，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、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。”在这里，邓小平同志不仅尖锐地指出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，而且还阐明了有关人才的一些理论问题。

恩格斯在总结流体静力学产生时指出：“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，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。”回顾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无不遵守着这一规律。

近年来，一门新兴的科学——人才学首先在中国诞生了。它的诞生，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，是时代的产物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本书的作者雷祯孝同志，于1979年7月在《人民教育》发表了《应当建立一门“人才学”》一文，首次提出了人才学的

概念。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。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积极的倡导下，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，关于人才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了，一些人才学的研究机构应时而生，有关人才学方面的杂志也纷纷问世。应当说，雷祯孝同志的建议得到了社会的反馈，受到了实践的检验。

作为人才学的倡导者，他没有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，而是脚踏实地开展了人才学的研究工作。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（第一卷）正是他三年孜孜以求的结晶。他不仅首次提出了建立人才学的倡议，而且还首次编撰了一部人才学的著作，这两个“首次”不是偶然的结合，而是互为因果的。

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有着悠久的灿烂的文化，也涌现过无数的杰出的人才。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才思想史。因此，研究人才学从中国人才思想史起步是有道理的。这不仅有利于总结我国几千年人才成长的主客观因素、社会条件等发展规律，让这些珍宝发出灿烂的光辉；而且从我国国情出发，有助于我国当代人才的开发。

俗话说：“万事开头难。”何谓之难呢？难就难在开头，难在前无先例可循，行无路标指引。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（第一卷）的编写，正如其他处女作一样，在它问世的时候，也难免还带着一些稚气。例如，资料的蒐集、观点的切磋、文字的提炼等，并不是没有工作继续可作。但是，这些并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，而且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它臻于完善。

我对人才的兴趣，由来早矣。从小就羡慕许多杰出的人才，求学时也立志成才，可是到了天命之年却仍然不才。不过聊以自慰的是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同人才打交道。爱才之心是

有的，也许这是我的职业注定的。这正是我与雷祯孝同志相识的原因。几年以前，读过他的文章，他作为一个人才学的研究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去年，经人介绍我们互相通了信，我表示有意聘请他到武汉大学任教，他应允了。就这样，他成了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。这时，正值他的《中国人才思想史》（第一卷）即将出版，他邀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，由于上述的原因，我无法推辞，于是就写了如上的一点感想。

最后，我衷心地希望一切有志于人才学研究的同志，在这一领域中多作工作，加强交流与合作，为创建中国的人才学和为最大限度地开发我国人才资源而努力！

刘道玉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日

于武昌珞珈山

• 刘道玉同志为武汉大学校长。

敢 峰

序

我同雷禎孝同志分别四年了，中间曾几次见到他。欣慰的是在遭受挫折之后，他并没有沉沦下去，而是在困难的条件下，埋头从事中国人才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。他的这种精神，很使我感动。记得在一九八一年，我曾写过一首《赠友人并自勉》的诗：“败事容易成事难，抚昔思今两慨然；君若真是有为者，炉火纯处炼‘金丹’。”炼“金丹”，谈何容易，有这种精神就十分可贵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自愧不如的。

中国人才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其中第一卷（先秦部份），雷禎孝同志已经写出来了。我粗略地看了一下《绪论》和《中国先秦人才思想概论》部份以及上编、下编的目录。雷禎孝同志再三嘱我为这本书写个序。天知道，我能写什么啊！我曾多次谈过，对人才和人才学的研究，我只是一个热心的支持者，并不是研究者，不要说是内行话了，就是外行话也只有那么可怜的几句。既自知为“黔驴”，又何必技穷？无奈盛情难却，就谈一点读后朴素的感觉吧。

中国古代的人才思想是一座宝库，特别是先秦时代，多种人才思想璀璨夺目。要真正研究进去，恐怕是要花费人一生的全部精力的。对此，雷禎孝同志确实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，并在浩瀚的人才思想大海中，表现了他驾驭知识和击水的才能。可以看出，在中国古代

繁纷复杂的人才思想中，他是设计了一个体系的，试图融多种人才思想资料于一炉，加以条理化和升华，但在一些地方，是“我注六经”还是“六经注我”，却有点“水天一色”难于分辨了。在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思想，如果这部书稿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问世，当不失为一部思想史的历史巨著，与同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们的名篇鸿著齐驱，可惜的是它晚出世了一个多世纪。不过，当时没有这样的著作问世，这是历史的延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直到如今，除了李树喜同志的《中国人才史稿》写了一个梗概外，也没有人象雷祯孝同志那样去进行大型的较为详尽的整理。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整理研究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，这是我们当代人才研究者的任务，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谈何容易，不要说登堂入室，就是资料也不齐，深入地研究更少。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，雷祯孝同志这部著作的问世，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。不管怎样，他是做了一件历史上应当做而没有做的事，在填补着一个空白。我们不能说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说不行也可以，那么行的东西现在在哪里呢？对书中有些观点、分析和表述，我并不赞成。例如《中国先秦人才思想概论》一开头的两段话：

“怎样做人？怎样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做一个发展得比较理想的人？怎样以这种发展了的人去改造现实社会促进社会条件更有利于人

的发展？

这个问题在人类刚刚从地球上出现时，人们便开始思考了，”

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，说透彻一点，这大概并不是历史的真实，而可能是作者把原始人理想化了。特别是，作者在人才学中提出“由现实的非人向非现实的理想人过渡”这样的命题，我是不以为然的，尤其不赞成把它说成是人才学研究的任务。对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在这里我就不多举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赞成这部书的出版。我想，这些属于学术理论上的问题，还是让学术界的同志们去讨论吧。炉火在开始时也难免会冒烟的，只有经过充分燃烧才能变得“纯青”起来；如果一看见冒烟就惊呼失火，似可不必。我还是那句话：人才学的研究，包括人才思想史的研究，目前还处在幼稚的阶段，只要有穿开裆裤学步的勇气，终有一天会把泰山踩在脚下。

说了上面一番话，是对是错，尚请禎孝同志以及各位专家和读者同志们指正。

敢 峰 于 北 京

一九八五年元月

• 敢峰同志为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。

自序

一九八〇年在合肥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才学学术讨论会时，敢峰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同我讲起过三个孙悟空。他说，一个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一个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，一个是戴上紧箍去取经的孙悟空。我想，在大闹天宫之前，还有一个拜师学艺的孙悟空；在取得真经之后，还有一个脱掉紧箍成为自由人的孙悟空。后来，我见到敢峰同志，对他说：孙悟空在唐僧念紧箍咒时，虽然疼痛难忍，但爬起来照样对唐僧喊一声：“师父！”“取经去吧！”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种人才模式：一种是千里马，一种是孙悟空。千里马的优点是“千里”、弱点是“马”，习惯于让人骑，只是想遇到个好主人而已。遇不到，就是怀才不遇；遇到了，便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象诸葛亮那样。这样，他们终究摆脱不了对主人的依附，被主人当作有用的工具加以爱护和照顾。孙悟空就不一样了，他在大闹天宫和压在五行山下之后，经过反省，接受了戴个紧箍去取经的现实道路。但是，他戴着紧箍仍然可以七十二变，仍然可以打妖精，打不赢时还可以请如来、观音、天兵天将帮忙，成为玉皇天庭可以接受的人物，同时又保留了孙悟空的个性，发挥了特长，顽笑洒泼依然自由，这对我们也易有所启发。中国几千年来，千里马式的人才很多，孙悟空式的人才也有，似应用心研究才是。

说起取经，正如敢峰同志在《序》中所说：“谈何容易！”一九八〇年夏天，我在北京忙得晕头转向，曾对葛实如同志说过，如果我们再回到贵州，人才学的研究才可能深入下去。《荀子·宥坐》云：“居不隐者思不远，身不佚者志不广。”英国历史哲学家汤阴比在他所著的《历史研究》中也说过类似的话：创造型的人物，不管是被迫还是自动退隐，都可以从自然中受到启发，在复出时又以这些启发来启发自己的同类。

八一年初，我回到了贵州。我想，任何思想理论的发展，大致都要经历“我诵六经——我注六经——我评六经——我立新经”这几个阶段。所以，我把研究的第一阶段集中到了我国先秦的人才思想领域中去了。本职工作之余，在胆内装着一百多粒石头的病患中，面壁三年，去敲开秘密山洞的石门。古代人才思想的窟藏，璀璨夺目。我被吸引着，被激励着。情不自禁，写了一首七言：

《人才颂》

故人长留天地间，
是非成败万仞山。
自古雄才多磨难，
从来纨绔少伟男。
保身总在明哲后，
爱民敢为天下先。
我为人才歌一曲，
千金难买一寸丹。

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D·D·Friedmann同我进行学术通信五年多了。她对中国人才思想的起源怀着浓厚的兴趣，几次来华要见我，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武汉实现了第一轮

会面交流。她和另一位教授对中国先秦的人才思想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好奇，很想介绍到美国去。

对于中国古人的东西，毛主席提出过：“古为今用”、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的方针。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中也讲过：“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，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；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，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；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，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。”我在整理、发掘、批判前人的人才思想时，不是想象着自己俨然要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，而是想象着要做推动当代社会前进的一个战士。本着这种原则，对于大量的前人思想糟粕，我采取了弃之不理的办法，除了对至今仍在发生消极影响的糟粕加以批判外，本书的写法，重在取其精华。由于思想水平有限，我之所取，未必都是精华。因而，恳请各位学者尤其是改革志士不吝指教。

也还是基于这种原则，“我注六经”与“六经注我”，有点“水天一色”难于分辨了。正象祖先和后代一样，后代身上继承了祖先的基因，而后代已经是独立的机体，绝不是祖先的复制品。

在书的结构上，我尝试采用了一种新的构成：简——概——详。简者，一万余字的引言。没有时间或没有必要读尽全书者，读了这一万余字，对先秦人才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发，便可知其大意了。概者，十多万字的概论。把先秦人才思想按发展阶段和内容分类综述和述评。《吕氏春秋·用众》云：“天下无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取之众白也。夫取于众，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。”我企图集大成而现其先秦百家人才思想精华之概貌，可供一般研究者评阅之用。详者，四

十余万言的“上编”、“下编”。按人才思想家或专著分章细列，详尽地引用其人才思想原文，可供专门研究者和爱好者查阅、引证之用。在现代社会书籍繁多的情况下，我采用这种写法，对各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者，是否略为兼顾到了他们的时间运筹，还不敢说这究竟是妙着还是败着。

差不多都是在深夜，我趴在厨桌上，凭借着国内外学者、友人、领导者给我的安慰、鼓励和支持，怀着一种对祖国人民和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心，我终于写完了现在印出的这一卷。为此，我要深深地感激他们。我的家人和朋友蒋庆、郑君华、葛实如、陈茂昌、李双璧等，在写作过程中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。为了以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，我邀蒋庆专门写了《庄子的人才思想》，邀郑君华专门写了《〈左传〉、孙子、吴起、屈原的人才思想》，邀我的中学老师杨开元专门写了《秦国的人才内流》，邀李双璧写了《孟子的人才思想》。蒋庆同志还为我修改过一些地方，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。杜任之、王守昌先生对我进行了指导。

在书稿用铅字印刷交给读者审阅之际，我不胜惶恐之至。炉火还在冒烟。我只希望把矿藏熔为一炉，加以浓缩富集。至于“金丹”，还要靠更深刻的人，才能炼出来。我也希望在这炉火中，来一次“自我涅槃”，在旧我之死中生出一个新我来。

我一直担心我完成不了中、外《人才思想史》和《人才论》两套书的写作任务。我渴望合作，我呼唤合作。好在有了几位有志于此的友人，已开始了合作的准备。然而，人力还是不够的。同时，我也希望还有别的同志独立写同样题材的书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有了比较，才能有发展。

最后，我还是重复五年前我讲过的两句老话。第一，人才